

## 無法置身事外的化外之地

黃冠閔\*

我們真的進入後疫情時代了嗎？自從「後」的標籤盛行之後，關於「後」本身的思考也容許有許多空間，語意的繁衍呼應著各種「後」思維的多樣化。

套用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書名《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1991)用法，似乎可以說：臺灣從未進入疫情時代。這種說法好像會誤導人，以為事情無關痛癢，但其實恰相反，並不是說臺灣未受影響，正因為疫情影響是全球性的，臺灣絕未置身事外。相較於 2020 年以來，全球五大洲各地的疫情數據，臺灣的數據顯得微乎其微，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臺灣有 951 例確診，9 例死亡，而為了判別是否有本土社區感染，衛福部還區分了境外移入和本土病例，因此有 835 例境外移入，77 例本土病例的差異。這樣的數據相較於其他地區的染病比例來說，是相對偏低的。除了在 2021 年 1 月底在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的感染造成短暫封鎖隔離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社區封鎖的案例。對比於歐美、蘇俄、印度、巴西等其他國家的各種封城措施，臺灣在封閉邊境後照樣有頻繁正常的交通、經濟活動，幾乎並沒有受到大規模的打擊。在這樣的對比下，臺灣像是一個化外之地，有些描述則稱為「平行世界」、「大型泡泡」，簡言之，國境之內的國民照常過著疫情來襲之前的生活，頂多是感覺到不能出國、取消某些大型活動、全民戴上口罩，除此之外，渾然不覺與外界的巨大變化有明顯差異。但是，這樣的化外之地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嗎？

面對這樣一個正在進行的事件，儘管疫苗已經進入施打階段，不同國家的施打進度不同，全球疫情或許可逐漸受到控制，但病毒變種持續被發現，抗體的產生或是疫苗的有效性如何，各國的疫情控制情況將如何發展仍有許多待觀察的點。防疫政策、醫療資源配置、生化科技開發、經濟體系支撐在此疫情時代遭受極大的考驗。在此同時，人文研究也必須針對正在改變的世界提出觀察。

從表面來觀察，可以逐步深入到行為現象所涉及的結構變化。回顧這一年來的歷史現象，疫情出現之初階段，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中國武漢有新聞封鎖

---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的情況，而後在中國宣布武漢封城後，世界各國才意識到此一疫情的嚴重性，隨著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數據逐漸攀升，歐洲的義大利倫巴底地區也開始大規模封鎖。臺灣幾乎在第一時間就開始封閉邊境，進而取消或縮減對外的飛航交通。在此之後，除了少部分的實地往來人士，大部分的真相獲得都是靠各種網路訊息，有些是靠媒體工作者，更多的是自媒體或個人的披露。病毒的蔓延則是產生諸多對此冠狀病毒變種的臆測，至少是其傳染速度、傳播方式有不同於以往的經驗，使得疫病學者、公衛專家都有不同的判斷。至於此病毒產生的緣由、跨物種的傳播途徑也都引發許多討論；新冠病毒究竟是人為的或是自然的產物，究竟是環境變數所造成的或是人類控制所直接、間接引發的，也都指向新冠病毒疫情的複雜性。這種複雜度揭示生命條件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人類的科技發展與控制思維下，不僅僅病毒造成疾病影響人類的生命，連帶地如何理解生命本身也因此經受挑戰。綜合以上的描述，可以從邊界、真理塑造、生命條件等方面來說明人文思考顧慮的層面。

## 一、邊界與封閉的思考

封閉邊境是疫情時代最明顯的地理限制。

在邊界的劃定上，無疑是凸顯「國家」控制最明確的力量。臺灣由於是島國，出入邊境都是靠飛行或航海，地理條件上具有封閉的優勢，但相對地也容易孤立於海洋中，對於邊境的感受十分明顯。在臺灣本島與外島澎湖、金門、馬祖之間本就須靠空運或海運連結，而離開國境到國外去，則是近 40 年開放旅遊後的記憶。「開放」或「封閉」邊境呈現的是政治力量配合著地理條件所造成的移動壁壘，在地緣政治的角度有一不可忽視的地位。而移動、遷徙、旅行牽涉的歷史記憶、地理認知、身體感受更是隨著疫情時代對比地有弔詭地呈現出來。

由於最靠近中國大陸，在武漢疫情蔓延時，臺灣快速地封閉邊境，此後在盡可能隔絕病毒散播的思維下，免受感染的恐慌，維持了在邊境內的經濟繁榮。事實上，封閉採取的是人、貨分離的策略，海島型的經濟體仰賴大量的進出口貿易，在客機航運縮減的同時，海空貨運並未減少。2020 年經濟發展未受到影響，並沒有改變臺灣經濟發展模式仰賴高度的外部供應這一事實。隔離與封閉，並未取消邊界以外的異域性存在，而外部性的重要從未稍減。

相對地，透過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呼籲，也提供大量的口罩給需要的國家，臺灣希望參與國際的需求、欲望更加凸顯。作為一個不被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

承認的國家，臺灣這一「化外之地」雖然透過封閉邊境而大量減低了疫情衝擊，卻不可能也不願意置身事外。邊境以外的世界仍然是孤懸海上的小島（及其周邊）所欲求的他方。不論是希望被承認的眼光，或是交易所獲得的利益，在外部性支撐下所勾勒的世界實在透過有形的邊界連結起來，愈是隔離，愈是渴望連結。

類似於有形的邊界，無形的邊界也隨之布置重組了政治經濟秩序。在 20 世紀末的全球化趨勢，逐漸轉變為關稅貿易壁壘，而中國崛起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格局下塑造了新的國際合縱連橫關係。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提升了國家封境下的經濟自主體系，配合著政治力量的拉鋸，使得內政、軍事布局都產生新的想像，或者說，塑造了新的敵對狀態。

不論有形或無形的邊界，疫情只是使得早已經存在的、局部的問題集中爆發。早在中東難民潮、歐洲各國收容難民時，早已經針對邊境問題有諸多分歧回應方式，並且激發了不同國家原本存在的內部問題，這從歐洲諸國極右勢力抬頭就可看出端倪。而美國在川普總統主政時期所激發的內部對立，也在邊境問題上多所著墨。全球化時代或許隨著疫情而有激烈轉型，但在「後疫情」時代是否就會降低邊界壁壘？恐怕就未必。

邊界、邊境的存在標示了外部性，模稜兩可的是，外部可以是奧援，也可以是敵人。面對或接納外來者，始終是一種問題的來源，並不是單一思維足以應付的。臺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只有早期或晚期到來的移民者，每一個人都帶著或多或少的外部性，卻又不能自外於此一社會。外籍看護、移工提供了本地欠缺的勞力，但是，這些新的移入者考驗著這一社會是否有善意迎納的對待。這類的問題其實對於每個社會都是考驗，臺灣在慷慨迎納的問題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慷慨迎納現實出一種交互性關係的思考。在邊界封閉時，遷移或國際移動的自由受到限縮，無法如往日般到國外旅行，這是一種自由受到限制。但是，旅行所具有的異地拜訪權取決於接待國的慷慨迎納。在疫情時代，異鄉人的移入有一帶來染疫的風險，拜訪者被視為潛在的危險，惟有提供檢疫證明，才能夠放行。視外來者為危險威脅，其實在 911 恐攻後便已經進入此一安檢層級提高的狀態，至少在美國如此；其他國家面臨恐怖主義威脅時，也採取類似措施。但疫病帶原者未必意識到自己是危險，或是，在疫病真正產生前，沒有人知道危險在哪裡。危險、檢疫證明、慷慨迎納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相當程度地指出了疫情時代的邊界條件。

## 二、真理塑造

知識與真理的配對關係，是所有人都關心的，也是科學的基石。

然而，在一切都仰賴網路訊息傳播、數據統計優先的時代，真理的存在取決於真理的形成過程。

有真理的地方，就有虛偽滋長處；謠言、說謊早已是永恆問題，雖說如此，但在網路傳播的時代，問題有全新的型態。隨著疫情散播、邊境封閉，究竟在他方發生的事情如何，逐漸無法採取親臨其地的方式得到認識。況且，隨著電子攝影、錄音器材的進步，無人機可取代人的足跡，採用不同於人貼近地面的角度，所謂的「親臨其地」已經有不同的詮釋模式。但同樣地，經過電子器材攝取、數位化技術處理後的訊息成為數據，而數據則成為新的事實的基礎，並進入了從事實到真理的製作進程。在這種情況下，真理的獲得又加上數據處理的面向，原本從認知、信念、語言陳述所構成的真理形成或真理認定過程，已經有不少超過素樸實在立場的複雜討論，如今，數據化的處理更使得真理認定、真理獲得的問題凸顯為真理塑造、真理形成的過程評估。

錄音、錄影材料是否經過剪接過程，似乎是判定原始材料的真實性判準。實際上，出現在公眾面前的每一則新聞、每一個影音片段都有剪接手段的介入。哪些片段被擇取、哪些陳述次序被安排、哪種角度被側重凸出、哪些背景音被過濾等等，都隱藏在剪接過程中。各種偏見或成見融入在影音呈現成果中，往往決定了閱聽大眾的取向。對這些片段的解讀卻也同樣取決於對於成見或偏見的敏感度，不論是兩極化、偏頗立場的選擇、極端相對化的懷疑立場都可能是對一段新聞、影音材料的詮釋。

真理的塑造、製作便伴隨著公眾意見的形成，決定了各種不同的人相信什麼。每一天在疫情中心公布的數據，左右著民眾對於疫情「實況」的情緒反應；在臺灣地區某處發生的數據變化似乎立即地牽動了所有地區的防疫態度，彷彿地域的差異並不存在、地理條件的限制並不會影響傳播的速度。一個詞彙的敘述「群聚感染」彷彿可以無差別地類比到任何一個不特定的群聚狀態，儘管「感染」、「傳染」的確是不會有差別的（年齡、性別、人種、貧富、政治信念等），但是，語言的抽象作用可以立即在人的情緒反應中得到印證。

## 三、生命條件

從病毒的可能起源和跨物種傳播途徑來揣測，引發了學者們對疫情與環境變遷的關係提出警告。人類介入環境變遷，造成物種滅亡、變種、生物棲息地

點轉移，以及地表景觀的改變、甚至地質變化等，是數百年來經濟模式朝向資本集中、技術密集攫取大量地球資源所引發的，甚至是數千年來人類社會不斷演進的結果，人類之間不只因為戰爭致使有些部族被消滅，也在發現新的疆域時造成其他物種的消失。從物種角度看待生命問題，不僅僅是隨著達爾文演化論以來的生物學課題，更是所有人類都需要調整的視角。事實上，這些問題都已累積經年，只不過因為疫情的大規模蔓延，更密集地將問題凸顯出來。

在疫情蔓延時，有各種揣測，由於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既是科學家之間也沒有形成共識。COVID-19 病毒究竟是人類促成的環境變遷造成的還是自然演化的？究竟有多少程度是人為疏失？目前都尚未有定論。而疫情對未來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乃是觀察的重點；由於各種隔離措施，使得國際間的旅行減少許多，諸多以觀光為主的地區都受波及，這種改變是否也有環境上的影響、程度如何？這些都發人省思。

無論如何，一個與病毒相關的思考是人工介入病毒研究所產生的後果。當代的基因科技、生物栽培技術等等，都已經可以看到人類在科學知識的生產時，將高度的人工化進程帶入其他物種的生命之中。正面的角度看，生物科技知識的累積確實在預防疾病、改進生活條件方面有客觀的成效，但是，負面的影響或者未被充分評估、或者被直接忽略，例如，物種之間的藩籬似乎在跨物種傳染的途徑中看到變種病毒的突破軌跡。這類的問題究竟是在哪種程度內被認知、被評估，往往受制於學科壁壘而無法清楚認識。除了涉及知識與真理塑造之間的問題外，也實質地要求此後的人類社會正視生命條件是否正受到改變的潛在危機。

生命條件涉及到物種之間的生態環境相關性，人類知識並不是孤立於一切物種之外的獨立領域，相反地，即使在知識形成的過程中，樣本取得、技術介入、人工化合物的產生已經進入自然環境中。不能只觀察其他物種、人類物種各自的生態關係，更要從彼此高度相關的角度來重新形成觀點。不僅僅大自然如此，連同人工生命的可能性也必須納入；基因工程是否逐漸影響到未來的人類世代，數據化的生活控制或回饋型態是否可能已經在影響人的思考判斷，進而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

#### 四、結語

有不少人認為在疫情之後，過去的人類生活模式會有巨大改變，卻也有不少人覺得，在疫情趨緩、疫苗有效普及後，人們將可恢復從前的生活。不論哪

一種情況，目前尚難判斷；不可否認的是，疫情的大規模已經點出了人類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許多問題，疾病既是人的身體健康條件的警示燈，也是人類集體生活必須重新省視的徵兆。

在邊界、真理塑造、生命條件這三個線索上重新讓人們體會到自由與平等的問題。哪些人的移動受到限制、哪些人的信念受到操縱、哪些人的生命（生活）條件被劇烈改變？人之間的自由與平等也連帶地捲入其他物種的存在，在人類物種內的關係困境也促使人們思考跨物種之間的關係。人文研究從知識與人存在的關係考慮問題，更要提醒：在這一全球性的疾病傳播事件上，我們無法置身事外；而且，我們不能僅僅從人類存在的角度看問題，更要從跨物種、跨越生命邊界的角度思考困境。